

1151
116

新民文史资料

第一辑

新民县政协文史资料

征编委员会编

1984年12月12日

引 言

一九八三年初，在新民县委统战部和县档案馆的协助下，找到了我在十年动乱中失落的张学良将军“西安事变”时写的手谕石印件。为使张将军的手谕公之于天下，我将它献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。

一九八三年七月，我接到了中国革命博物馆给我寄来的荣誉状和一封信。信中感谢我献出了张学良将军在“西安事变”后，送蒋介石回南京，临行时写信给东北军各军、师长的手令石印件等珍贵文物，随信还寄来一百元钱，表示奖励和纪念。

这封信又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和对张学良将军等杰出人物的怀念。

编 者 的 话

《新民文史资料》和读者见面了，它是高举爱国主义旗帜，开创文史资料工作新局面的内部刊物。

文史资料是当事人的亲身经历或亲闻、亲见者的记述。它即弥补了历史文献之不足，为社会科学、历史研究、文艺创作等部门提供了重要的参改材料，又为教育人民，特别是青年一代提供了生动的教材。在继承和发展祖国文化遗产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起到积极作用，通过文史资料的征集和出版工作，将加强我们同社会各界人士的关系，促进爱国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。

胡耀邦同志在中共中央邀请各方面人士举行的民主协商会上，发出了“毋忘团结奋斗，致力振兴中华”的号召，这个号召的核心是爱国主义。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和崇高的美德，是推动祖国历史前进的一种巨大精神力量，它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，可以促

进各种不同出身、不同经历、不同职业、不同民族、不同年龄、不同文化程度、不同信仰的人团结起来,这也是我们实现祖国大团结、大统一的思想基础。政协是爱国统一战线组织,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,是政协文史资料的方向。

文史资料,以翔实、具体、生动的史料,从各个侧面反映中国的实际,记录了戊戌以来到“文化大革命”的风云变化。通过文史资料,使人们一方面可以看到在反动制度的统治下,祖国如何一步步地走向贫穷、落后的困境,内战和外敌的侵略,给人民带来的苦难,另一方面可以清楚看到中华民族是具有反侵略、反压迫、争民主的优良传统的,是勤劳勇敢、有智慧、有高度民族自尊心的;多少仁人志士为深求救国救民的道理而呕心沥血、奋斗终身;多少老一辈革命家为争取国家独立,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,前赴后继英勇善战;多少爱国的思想家、科学家、教育家、文学家、艺术家、实业家等在困难险恶的环境中,勤奋工作作为振兴中华作出了自己的光辉贡献。这些史料,使人们深深感到创业维艰,今天来之不易,从而激发爱国热情。

文史资料“要存真，要实事求是”，只有忠于事实，才能忠于真理。撰稿人可以不拘观点、不拘体裁、不拘长短，但必须忠于历史，秉笔直书，不为亲者讳、尊者讳，不溢美、不贬损。要认真贯彻这个方针。

本刊是在全国政协第四次文史资料工作会议的精神指导下，在市、县各级领导的重视支持下，并得到各有关单位和热心史料工作的同志热情帮助，终于编就第一辑，在此一并致谢！

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和经验不足，错误在所难免，尚请读者不吝指正为幸！

热烈欢迎各方面同志向本刊供稿！

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日

跟随张学良将军前后

(回忆录)

赵新华口述，孙震、何再治整理

目 录

引 言

- 一、我是怎样进张公馆的····· 1
- 二、在张公馆的日子里····· 9
- 三、少帅生活点滴····· 13
- 四、试骑“盖西北”····· 17
- 五、“西安事变”见闻····· 26
- 六、三见周总理····· 31
- 七、我所熟悉的张将军的几位副官····· 37
- 八、保管张学良将军的财物····· 42
- 九、同张学思的交往····· 47

一、我是怎样进张公馆的

我原名叫赵国清，“九一八”事变后改名赵新华。十六岁学裁缝，我兄弟赵国栋在兵工厂工作，经他介绍，一九二八年我到东北军兵工厂庶务处制服部当裁缝。有一次，张学良将军到工厂视察时，我见到了他。这以后又先后见过几次，但都是一走一过，没有说过话。后来，一个偶然的机会有幸结识了张学良将军。

记得那阵子大帅府的一些副官常去做衣服。张学良将军有一个副官叫夏宝珠，他同兵工厂稽查员张子明很好，张子明同我是磕头兄弟，通过张子明我认识了他。

有一次，夏副官随张学良将军一起到兵工厂来，我正好遇上，张学良将军穿一身深灰色料子西服，衣料很好，听说是日本犬养毅首相送给他的，可是上衣做的有点毛病。有一个袖头，料子缝没对上，细看有点往外扭。我就对夏宝珠说：“少帅的衣服有毛病啊。”夏宝珠说：“是呀，少帅早就看出来，可收拾不

了，你能收拾吗？”我说：“你拿来吧，我试一试，我琢磨着差不多。”

过了几天，夏副官真的把衣服拿来了。我把袖子拆开，把长的那边去了点，短的那边喷水用烙铁加热后，往出抻了抻，完事又缝上了。这回儿，缝基本对上了，不仔细瞅是看不出什么毛病了。衣服做好后。夏宝珠拿走了，我没有同张学良将军见面，听夏宝珠说张学良将军挺满意。后来，夏副官又让我为张学良将军改过一条裤子，藏青色的。

“九一八”事变以后，兵工厂让日本人占了，我不愿意侍奉日本人，就离开了工厂，随东北军季殿凤旅长带的一百多人去关里。

当时，日本兵十分嚣张，锦州以东地区都不大安全，遭遇战时常发生，因此在途中我们高度戒备，人不解甲，马不卸鞍，随时准备战斗。

一天晚上，我们行至大凌河东岸的一个村庄住了下来，这个村紧靠公路，半夜时分，哨兵听到远处有汽车的马达声，马上报告季旅长。他一听，知道情况不好，立即招呼大家起身。可是还没等我们上马，村里就挨了两炮，

几间房子起了火。季殿凤把手一挥，喊了一声：“上马，冲出去！”大伙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就乱哄哄地往村外冲，谁知一到村口，立即被雨点般的机枪子弹压了回来，村子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日本人包围了。

一看这火力，大伙就知道是日本鬼子的军队围上来了，季殿凤和大伙一碰头，决定带十几个人先打开一条通道，然后大伙跟着往外冲。于是立即行动，季殿凤带领十几名骑马技术好、手枪准的骑兵立即向路口冲去了，其他人在路口附近隐蔽，由于人少目标小，没有引起敌人注意，一次就冲出去了。他们压住了村口的机枪，大伙随着就冲出了村。

日本兵一看我们的队伍冲出去了，立刻发动汽车，加足马力紧追不放。敌人不断地向我们射击，密集的子弹落在我们的周围，地打的直冒烟。当时被打下马的，大伙也无力援救，没被打下马的就边还击边跑。

跑了一程，天已放亮，忽见前面不远出现了一片小树林，大伙心中暗喜，心想只要我们一拐进树林，日本鬼子的汽车就没用了。可是刚到树林附近，却想不到树林里面有人朝我们

打来了冷枪。从那稀落的枪声中断定，树林里埋伏的不是日本兵，而是少量土匪。大伙这个气呀，心想，日本鬼子打我们就够呛了，你们咋还乘火打劫呢？真是太可恶了！季殿凤立即命令侯排长带领一大部分人沿大路往前跑引走日本兵后，再折回来；一小部分人由他带领分两路向树林包抄过去。树林中的十几个土匪一看不好，撒腿就跑，我们就这样占领了小树林。侯排长带领的那部分人往前跑了不远，就下了公路，甩掉日本兵，也回到了小树林。这次遭遇战，使我们损失了好几个弟兄。

在小树林里休息时，不知是谁说了一句“哎呀！新华，你腰上挂彩了！”我用手一摸后腰，粘乎乎的，一看全是血，我立刻就慌了。也不知咋那么怪，刚才还象好人似的，这会儿一见血，马上就不能动了，这时，我才想起来，刚才日本兵追我们时，我只觉得有什么东西拽了我一下，但当时过度紧张，根本没有想到我的肚子被子弹打了一个眼儿。那颗子弹是从前边肚脐左上方五指远的地方打进去的，从后腰眼上穿出来，但却没有伤着内脏。在锦州包扎时，医生们都说，这真是个奇迹。后来经过一

段时间治疗，只是后腰上留了个大疤拉，而没落下什么残疾。

我们继续向关里走，走到了天津。在天津东北同乡会，又看到了夏宝珠。他一看到我挺亲热，问我：“你怎么也到这儿来啦？”我把情况一说，他挺同情，问我以后打算怎么办。我说：我现在还没有着落呢，得请你多帮忙啊！”他说：“那你就给司令做衣服。”我说：“那我等你的信吧。”我们就这样说定了。

那时，少帅行营在北京，夏副官家也在北京。我等了一段时间没有信儿，就直接到北京去找他。他见到我以后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唉，不是我不守信用，少帅要出国了，现在正在上海戒毒。给少帅做衣服的事就得以后再说了。”他想了想又说：“这样吧，我给于学忠写封信，让他帮你安排个地方吧。”我说：“那也行。”于是他就给于学忠写了一封信。

那个时候，于学忠是五十一军的军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。住在天津海河北。我拿着夏副官的信去找于学忠，他把我介绍给民政厅。民

政厅长叫魏健，“九一八”事变时当过新民县县长。听说我是新民人，待我挺客气。让我到河北省易县去当公安局长。他告诉我易县县长也是你们新民县人，到那方便。可是我不愿意干。我说：“我还是干老本行吧。”他同意了，就这样，我到了五十一军辎重总队军工厂上班，这个军工厂其中大部分是东北军兵工厂的老底子，到那熟人挺多，又让我当了工长，负责裁衣服。

一九三四年，张学良将军结束了八个月的出国考察，回到武汉。我知道后往武汉给夏宝珠写过一封信。但没有收到他的回信。

一九三五年五月节以前，于学忠被调到西安，辎重队也随他去了西安。我们到工厂住在西安东大街路北。这时西安的张学良公馆也建立了。听说少帅府的人先来了一部分，不过少帅还没有到。

有一天在兵工厂突然碰到了夏宝珠，原来他已随同少帅府的人先来了，我俩一见面，他就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：“你可真有耐性啊，还做这个呢？这回好了，副司令来了，你就到公馆去吧。公馆里还有你一个近同乡，叫刘海

山，是新民旧门人，给副司令当副官，副司令很信任他，我们俩一同跟副官长说：“准成”。

第二天，张学良将军的副官刘海山派传达兵坐着小汽车到兵工厂来找我，到来就喊：“谁叫赵新华”，我说：“我是赵新华”，“请你上车吧”刘副官和夏主任请你去”。这时，夏宝珠已经当上了承启处主任了。我一看小汽车，车号是七〇四，吓了一跳，我知道七〇四号车是少帅夫人于凤至坐的，这车怎能让我这样身份的人坐呢？我赶忙问：“弄错了吧？”传达兵说：“你不是辽宁新民县的吗？”我说：“是呀！”他说：“那没错，就找你，上车吧。”这我心才落了底。

上车后直奔张公馆，进院后车头还没拐过来，夏主任和刘副官就迎出来了。夏主任拍着巴掌说：“哎呀！来啦！来啦！我们还怕你上街玩了昵！来来，介绍介绍。”他指着刘海山说：“这就是你的近同乡刘海山，刘副官。”又指着我对刘海山说：“这是赵同乡，赵新华。”没等他介绍完，我们的手已经紧紧地握在一起了。刘海山问我：“工厂那边有事

吗？”我说：“没什么事。”“那好，咱们三个出去溜达溜达吧，你是喜欢听戏还是乐意看电影？”我说：“那样都行。”可就是让你们破费了。”刘海山说：“你说哪去了，他乡遇故人，这是幸事。走！”我们来到街上，刘海山掏钱，我们吃了一顿饭，又看了一场电影。晚上回到工厂已经小半夜了。第二天吃完晚饭，他们又来找我，到公馆先洗了个澡，完事又是我们三个人一起上街看的电影，过不多日子，经夏宝珠、刘海山二人给副官长谭海介绍，我就进了张学良将军的公馆。

二、在张公馆的日子里

张学良将军在西安的公馆，住在金家巷五号。

这个公馆大门朝北，四周有一人多高的青砖墙。进门后左侧有一排房子，第一个门是传达室，紧接着传达室的是承启处，但与传达室隔一道门，门边还有一道岗。与第一排房子平行的有三栋楼，张学良将军与家眷住在中楼；卫士与几个处的工作人员住在西楼；秘书与外来客人住东楼。西安事变前后，有一位刘先生就住在那儿，后来，周恩来、董必武也在那儿住过。三栋楼的后面，还有一排房子，伙房和会计等行政事务就设在那里。

张学良公馆的外边有手枪营站岗，里边都是卫士站岗。张学良公馆共有六十名卫士。都是尉官；有八名副官，都是校级军官；副官之上有一名副官长是少将军衔。西安事变前后，副官长是谭海，他也是东北人。承启处有一个承启主任，一个承启副官，一个二等录事，两个当差的共五人。那阵子承启主任是夏

宝珠，承启副官是刘世斌，辽阳人。我是二等录事。

承启处的主要任务是负责登记、接待、安排见张学良将军的人。不见张学良将军的人一般由传达室接待。要见张学良将军的人，由传达处把名片送到承启处，承启处登上记，写明姓名、职务，然后报张学良将军批，记得当时有的批上午见，有的批下午见，有的批明天见，也有批不见的。张学良批回来后，由承启处通知。凡是来见张学良将军的人，一律不能带武器。通过门岗，由传达室来到承启处，一般都要在承启处稍候一会。东北军军官及其它客人，到承启处以后，一般都把风衣、帽子等脱掉，挂在承启处。见张学良将军回来以后再经承启处出去。客人见张学良，大多数是在张学良将军的会客室里，会客室在张学良将军住的那栋楼楼上。

我被调到承启处去当录事是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的事。

十一月上旬的一天，夏宝珠告诉我司令部的副官处马处长找我，我去了以后，马处长交给我一个任务，让我调查一下西安城里和市郊

各个部队的分布情况，包括中央军、西北军、东北军的留守处、办事处、仓库、部队人员及武器装备等情况。马处长交给我一个簿子和一封司令部副官处的证明信。我拿着信去调查。在调查时，东北军当然没什么说道，西北军也没出什么差头，就是调查中央军时，遇到点麻烦。

那时，中央军驻在西安的部队有三个，一个是胡宗南的第一师留守处，一个是中央十二师，还有一个师现在记不清他们的番号了。我们调查到他们那里时，他们不让调查。傲气十足。我拿出了证明信，他们仍然不答理。我回去一说，副官长谭海又给开了个特别证明，另外派了一台小汽车。让我坐着小汽车去，这回他们才让调查。

调查完，我把那个簿子交到司令部副官处，马处长挺满意，记得那正是西安事变前二十几天的事。

我常出去西安市内各界或周围几个县给张公馆办事，如为“东北救亡总会”募捐，为司令部到武昌、九江、广州、福州买红大绒等等，当时张公馆的同事和司令部的副官们给我起个